

新时期小说的 自我认同

王金胜◎著

XINSHIQI XIAOSHUO DE ZIWO RENTO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青岛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

新时期小说的 自我认同

王金胜◎著

XINSHIJI XIAOSHUO DE ZIWO RENTO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 / 王金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604 - 0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62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 李 群

副主任委员 张全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安世银 张 华

蒿 峰 颜世元

序

吴义勤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转型期，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时段。在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近 30 年间，中国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到艺术世界，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国文学也在政治意识形态、市场（大众）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等不断转换、错综纠缠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寻找自我、调整自我、建构自我，走过了起伏跌宕，也是恢宏壮阔的 30 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以小说成就最为显著。也正因此，学界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一直处于“重中之重”的显要位置，从宏观理论研究到个案文本解读都收获了大批颇有深度和新意的学术成果。后起的研究者要想继续创新或拓深，研究角度的选择与确立就显得特别重要。

王金胜在师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就对新时期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对新时期文学的系统研究，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他的文学阅读面宽，理论储备充足，学术思辨能力强，这为他在此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博士论文选择“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这一具有宏大话语体系建构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论题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王金胜的博士论文以“自我认同”为切入点，从文学作为自我认同的方式和载体这一角度，考察新时期小说自我意识的生长，对新时期小说创作进行了总体考察、辨析和评估，力求以此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其选题的眼光和立意都为我所认同与欣赏。当然，不可否认，这样一个论题又有巨大的难度，对王金胜的作品阅读量和理论思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令人欣喜的是，他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一份令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满意的答卷。

根本上说，从自我认同的角度重释新时期小说，自然离不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现代性。新时期小说叙事的认同建构与中国现代性密切

相关。而“现代性”恰恰又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实难完全挣脱这一“话语场域”的强大吸力，但具体做起来，各家又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固然显示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关联之复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却又彰显着这一话题的魅力和内蕴的强劲学术生产力。王金胜的做法是，从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发生、展开、嬗变入手，较为充分地分析了现代性的本土发生和中国特性，进而将现代性转化为一个“中国文学”的命题。再进一步看，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中，王金胜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意识和新时期小说由此困境意识所生发出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应该说，这种对中国现代性特质的理解，有其独特之处，也有其历史的依据。其一，中国现代性始终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意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脉深远的后发现代性国家，中国对现代性有着难以言传的暧昧与纠结态度。20 世纪中国文学也因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之间的宿命性缠绕，往往将这一态度和情感内化为叙事或抒情的脉络与肌理。而众所周知，内蕴于文学中的认知、情感与判断，往往呈现为更为复杂的情状。其二，新时期以来，传统的社会秩序、伦理结构和文化心理模式因受到剧烈的冲击而分化、变形乃至瓦解，器物、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瞬息万变，处身变动不居的旋涡中，作家们失去了对自我角色进行有效理解和评判的相对稳定的依恃，同时，作为传统秩序的反叛者，新生的主体往往又与其实存其间的社会环境，处于一定程度的脱节状态。“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就成为最尖锐也最根本的问题。故此，作家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格外关注就成为一个他们不得不时时面对和思考的切实问题。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握新时期深隐复杂的历史文化脉动对作家的自我认同及其叙事表征的影响，如何才能在深入发掘不同时段文化与文学间的连续性的同时，揭示出其间的差异性。这构成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要对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意识、自我认同的危机及其文学（叙事）表征之复杂关联进行富有说服力的阐释，就需要在借鉴西方的理论范式或学理概念的同时，将现代性、自我认同、认同危机等这些涵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领域的理论、术语进行本土化、语境化的重释，并借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从而有效避免用西方概念、理论、方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所面临的错位难局，避免理性逻辑框架对中国作家自由精神、真实的感受方式和心灵脉动的肢解和吞没。既要在研究中阐发出新意、创见，又要符合

理论的逻辑、中国的事实和文学的情感表现逻辑，并且不嫌生硬、穿凿，此中难度可想而知。总体来看，王金胜的博士论文在这方面的处理较为得当，它将新时期小说置于全球化语境中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予以探讨，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社会、政治之间循环往复的对话、呼应关系。持论公允，论证有较强的说服力，行文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将艰深的理论化为畅达的表述，并时见个人的独到思考与见解，显示了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清晰的学理意识。

勃兰兑斯有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王金胜以历史（社会，以“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为关键词）—主体（自我认同，以“认同危机”为核心）—文学（以新时期小说思潮和作品为重点）为研究范式，着力于展现现代性、自我的认同建构与中国小说叙事美学嬗变之历史承传与变异，从而有效地揭示并呈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条潜在的精神线索。新时期作家的认同危机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内在动因，诸凡小说思潮的嬗递，叙事姿态和方式等的演进，均为作家表达自身现代性生活体验，建构自身文化身份，克服认同危机和现代性焦虑的重要表征。王金胜围绕着这一认识所展开的分析，史论结合，宏微相间，进一步深化了新时期小说作为“心灵史”、“精神史”或“灵魂的历史”的研究。从人学理论到现代人本思潮，论著以“人的发现”紧紧抓住新时期小说主潮的演进，从“自我认同”的独特视角，解读流贯于小说中的主体表现，尤其注重对小说叙事中的缝隙、断裂、矛盾，价值判断中的游移、含混，以及文本在叙事美学等方面的突出特点的分析，这便从一个很重要又很内在的视镜中，观察到了小说叙事背后的创作主体“自我认同”的种种表现，还原了中国作家自我认同在文化心理机制上的复杂性、深邃性与价值判断上的含混性、多向性，从而有效地考辨了作家主体心理或精神结构循着中国现代性演变的轨迹和小说叙事美学得以形成的深层机制，层层揭示了新时期作家主体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现代性悖论之间的潜在关系，深入地论析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创作主体心灵的嬗变和小说叙事艺术转换的内在精神理路，较好地挖掘了深埋在小说叙事形态生成、演递背后的历史—精神动力学因素。

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及其叙事艺术的研究，不仅是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人”的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王金胜在其博士论

文中对新时期小说家的主体认同及文学的自我认同两个层面的论析相当充分,对新时期文学整体特征的观照也相当有力度。他立足宏观的学术视野和发展的文学史观,不仅对“自我认同”的界定有着追根溯源的梳理,而且在扣住作家作品分析时,也都有意识地突出了这一理论线索,使论著有了“坐实”的实证分析色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能充分占有和切实掌握作品、文论、创作谈、书信等第一手资料,对新时期小说的重要思潮和现象,如“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一系列小说形态,进行系统的纵向缕析和认真的梳理、概括,对各种形态的小说文本有着探幽发微的感悟和解读,在对新时期小说“重读”的过程中,确立了新的理论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估了新时期小说的历史—美学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从艺术层面回顾了新时期小说创作走过的艰难路程,并指出新时期小说开初对社会化、政治化历史和现实的积极介入,充分展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但它又因无法实现个体思考对群体性话语的穿越,尤其是近乎功利的叙事目标,而很难敞开艺术想象和形式创新的大门。这种深刻细致的分析论证在他这本论著中几乎随处可见,其背后彰显的则是他令人欣慰的理论功底及学养厚度。

我们看到,经过王金胜还原性的重构,新时期小说重新返回到了其本初的含混错综,而非平滑、纯粹的状态。千头万绪,清晰不再,却元气淋漓,姿态横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也许有些过于平面化和“规范化”了,某种意义上,它甚至被某种研究惯性或“经典化”也即“合理化”程序身不由己地控制,成为了一种精巧、细致的知识生产和话语操作。在此情境下,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更多的必要的反思,突破已有的模式化的臃肿烦琐的知识生产,回到现代以来激流澎湃、暗流涌动的,也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进程,重建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应有的与“世界”对话、对“现实”发言的个性与品格,重新激活文学研究(批评)的想象力和批判性,使文学研究(批评)释放出巨大的思想能量和面向当下的蓬勃的思想活力,建构起我们对世界的另一种发现和理解,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难以规避的一个问题。就此而言,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重返80年代”可以视为这一反思性研究的重要症候。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应该包含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品格——对研究对象(作家、作品)的历史性的深刻体认,对研究主体(批评家)

历史性的清醒与自觉，关注“美”、倾情于“诗意”，但又不缺少对“美”与“诗意”的历史性维度的阐释热情。从这个意义上看，王金胜的这本学术著作以自己的思路和方式参与了对这一资源的重新发掘和辨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很高兴，王金胜的这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即将付梓出版。我相信，这本书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和王金胜本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新时期文学研究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富有深度和创新意味的最新学术成果，而且在方法论和开拓性上都对新时期文学研究具有启示和推进价值；就后者而言，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将是王金胜个人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潜力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欣赏。衷心祝愿王金胜以此为起点，在他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为我们贡献越来越多的精彩学术著作。

是为序。

2013年国庆节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绪论 文学：作为自我认同的方式与载体

——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是人学”说起 (1)

第一章 “人”的意蕴与艺术形态：“新时期”初期小说的

启蒙叙事（上）

——“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的自我认同 (14)

第一节 “启蒙”：在“五四”和“新时期”的不同文化语境中 (14)

第二节 “个人”与“人民”：“新时期”初期小说启蒙叙事的
内在缠绕 (25)

第二章 “人”的意蕴与艺术形态：“新时期”初期小说的

启蒙叙事（下）

——“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的自我认同 (41)

第一节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新时期”初期小说启蒙
叙事的精神底色 (41)

第二节 丰艳的人民言说与苍白的自我反思：“新时期”初期
小说启蒙叙事困境之一 (59)

第三节 追随或超越：知识者如何面对“人民”
——“新时期”初期小说启蒙叙事困境之二 (70)

第三章 断裂与接续：“现代化”的艺术形态及其意蕴

——“改革小说”的自我认同 (90)

第一节 想象现代化：作为历史与现实的联结物 (90)

第二节 “历史”的镜像：在现代化的叙事视野中 (98)

第三节 想象现实：在现代性理念制约下的浪漫化叙述 (109)

第四章 “传统”抑或“现代”：悖论中的选择

——“寻根小说”的自我认同 (120)

第一节 启蒙或其反叛：作为群体性叙事的“寻根小说” (120)

第二节 “根”的寓言：作为现代性装置的透视物	(133)
第三节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145)
第五章 叙事转型中“人”的生成与存在形态	
——“先锋小说”的自我认同	(161)
第一节 主体：激进的现代化与自我取消	(161)
第二节 拆除深度与意义的重建：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 意识形态性	(175)
第六章 市场化语境中主体的位置与姿态体	
——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的自我认同	(188)
第一节 陷落与飞翔：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的“日常生活” 叙事	(188)
第二节 “自我”的镜像：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的 主体意识	(202)
第七章 破碎的自我镜像	
——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的自我认同危机	(215)
第一节 自我认同与认同危机：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 辩证	(215)
第二节 新闻化·影像化·细节化：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的经验 主义色彩	(228)
第三节 “结构”或“解构”：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中的“结构” 意识形态	(241)
结语	(256)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76)

绪 论

文学：作为自我认同的方式与载体

——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是人学”说起

进入“新时期”以来，置身于全球化文化语境的中国文学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现代性不仅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观念，影响到我们最为个人化的生存层面，而且也与个体生活甚至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在塑造人们自我的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① 一方面，现代性在塑造着自我认同新机制的出现；另一方面，自我认同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自我的先在特质或各种特质的组合，而是个体依据其个人的经历进行反思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而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对制度与自我的反思。因此，“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是小说家主体的自我反思与社会变迁互动的产物。

何谓自我认同？查尔斯·泰勒把它表述为“我是谁”这一涉及人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② 在这里，泰勒为我们指明了认同对于个人在安身立命方面的至关重要性，揭示出自我认同问题就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在处理与社会及他人的关系时，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② [加]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以一种稳定的具有终极价值的世界观为指导，确立和认证自身的问题。

对于无论是以个体形式存在还是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来说，他对包括历史、现实、世界、事物、他人等在内的外部世界的认知，都有一个起点和根本的动力，那就是对自我的认知和对自我的确认，即自我意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意识，自我意识是人对自身的意识，是“意识返回到自身，是在它的对方中意识到它自身”。^① 对自我的认知显示着人的解放的自觉程度。自我意识包括两个基本内涵：自我价值意识和自我生命意识。自我价值意识是对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可能性和自身确认应具有的价值可能性的向往、追寻和实现的过程，以及对之所作的审视和评判。而自我生命意识就是对自我价值的向往、追求和实现过程的自我生命体验。存在于个体有限生命与自我无限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使个体对于自我的意识从模糊未名中凸显出来。也就是说，自我认同的核心是自我的生成或重新生成，因而，对于主体而言，自我认同问题的解决还与个人不断建立新的“自我”的主观努力分不开。萨义德说：“葛兰西在《狱中笔记》（*Prison Notebooks*）中这样写道：‘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认识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唯一可以找到的英文翻译令人费解地到此为止，而葛兰西的意大利原文实际上紧接着还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因此，找出这一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② 所以，自我认同是一个心理学命题，有一整套完整的心理运作机制，通过它我们得以安身立命，但自我认同既要人的自我为轴心运转而又不能通过单纯的自我观察、自我思虑来表现，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需要通过我们与世界、他人、自然的各种复杂深幽的关系，通过我们对待外界各种事物的态度，借助政治、伦理道德、宗教、文化、审美等各种资源来实现，所以它又是一个社会学和人学命题，是在人类总体生存状态中构成的整体的人的自我身份感，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自我确认，需要各种资源，因为我们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确认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开始追问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总是在问：我们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国家、世界以至自然界的关系怎样？”所以“重新确认自己

① [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3页。

②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页。

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获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的一种方式。”^①

实际上，无论在中外，自我认同问题对于人来说并非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话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作为认同的核心自古如此。正如加拿大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所说：“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② 只是进入现代性情境之后，传统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伦理结构和文化心理模式因受到剧烈的冲击而分化、变形乃至瓦解，使人失去了对自我社会角色进行有效理解和评判的相对稳定的客观基础，同时，从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中走出的新的自我意识和观念与其实存其间的社会环境，又处于一定程度的脱节状态。生活于这种“中间”或“过渡”状态的人既无法在传统社会制度、伦理结构、道德评价体系等所提供的视界中确立自我的某种内在本质以及在社会网结中的位置，又因对现实社会状态的某种不适应，而难以实现对周围事物和自我的完整、稳定的认知，为此就需要重建认识自我的框架，寻求新的自我认同，故而人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格外关注。所以，自我认同又被赋予了浓厚的现代色彩，而成为一个包括小说家在内的每一个生存于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可不时面对和思考的新问题。

中国“新时期”小说产生、成长于中国高度同质化社会的解体，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诸种文化要素杂糅并存的“混合型”历史语境中，它必然面对自我认同/认同危机这一国人必须面对和认真对待的问题。小说家作为置身于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敏感个体，必然以个体化的艺术把握方式和艺术传达方式呈现出自我的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性别等各个层面上的形态及其内涵。也就是说，自我认同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一个人学命题，更是一个文学命题。当他作为人类一员而存在于世界上，尤其是存在于“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语境中时，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追问更加迫切。自我认同对于小说家来说，就是一个富于复杂性韵味的文学命题，也即，小说家是以文学/“小说”的独特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小说家

① 汪晖：《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加]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通过书写行为寻找自我归宿感,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来表现个体在危机情境中为确定自我方向感和位置感所采用的想象化的解决方案,来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自我的游移、矛盾、困惑,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内在性深度(inwardness)的自我。究其实质,所谓文学的自我认同就是创作主体通过艺术的方式进行反思性投射,使先天的、无方向的本体安全得到引导和形式化、话语化,从而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可审视性。创作主体以文学独有的艺术把握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揭示出既作为社会关系集合体又作为孤独而独特的个体,既作为本性化的单个自我又作为自由化的类,走向具体的自我的实体化的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会处的形态、精神和心理。文学的自我认同以艺术的方式表现现代人在现实处境中的自我认同/认同危机及其追寻、克服的努力,并以文学的方式显示并促进文学向自身的回归。文学既是创作主体自我认同意识、行为的艺术化展现,又是特定历史语境中包括创作主体在内的现代人认同处境与危机的文本显露,这些在小说叙事文本的深层和艺术形式上都会有所表现,也就是说,“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只能是文学化的自我认同而不是其他。对于作家来说,他的自我意识是通过他在作品中对世界的感知、体验和评判,以艺术写作实践的方式对自我心灵世界的检讨、追索、拷问而体现出来的,而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和精神品格就是作家自我价值意识和自我生命意识的真实写照。

文学不仅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反映,甚至也不仅仅是人对世界的“掌握”和改造,它首先是人这个主体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在这种艺术活动中,人不仅要实现对世界的“掌握”,还要实现对自身的“肯定”,两者并非直接同一、相互包容的。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属于思维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问题,它所要解决的是这种认识和反映是否具有真理性问题,对于艺术这种掌握世界的方式来说,就是要解决这种认识和反映是否具有真实性问题。但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不能代替人在艺术实践这种感性活动中对自身的肯定。在我国文学界,因为长期受到单一的艺术反映论、艺术工具论的影响和钳制,过分强调文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掌握”功能,而使文学失去了应有的艺术独立存在价值,对文学创作主体在艺术实践中显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实现自己的个性和品格,从而在对象中确证自我,实现对自身的“肯定”的一面,则没有充分重视。

艺术活动作为人对自身的“肯定”之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来的。他指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 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性的存在，从对象这一客体方面来说，是人这一实践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从人这一主体方面来说，则是对自身本质力量包括个性等的自我确证或实现。对象之所以成为人的对象，在于物与我的统一，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与对象性质的一致。这样，马克思从原则上指出了，人类使自身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在对象中“肯定自己”的活动，只不过不同性质的本质力量，形成各自不同的“肯定方式”而已。同时，马克思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见解，则说明人类借以“肯定自己”的艺术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思维—认识活动，而且包括全部感觉活动，这对于探讨艺术的“肯定”功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人通过艺术实践活动在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复现”和“直观”自身，他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对自身的“肯定”。

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以“文学是人学”为核心的关于创作主体精神的理论，虽然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而时断时续，但还是不绝如缕。胡风认为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弱关键在于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作家的这种精神“拥入”作为“对象”的社会现实，经过作家的“自我斗争”，最终达到“自我扩大”也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② 但这一思想最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页。

^② 详见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理论部分），收入胡风晓风编选《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的时间内，由于“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盛行的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它涉及了哲学、文艺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许多学科，对人性的概念内涵、人性与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新时期文学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引发了80年代中期那场关于“人的主体性”和“文学主体性”的激烈论争。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钱谷融，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刘再复。其中，在第一阶段被压抑的“人学”传统在80年代被重新发掘和评价，从而在实际上积极参与了“新时期”“人学”理论版图的绘制，并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文学自“五四”到“新时期”虽潜隐却有力的“人学”行进路线。

钱谷融的“人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文学是人学”》^①和经过删改后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②。因为后者坚持了此前的基本观点，保存了当时的“基本思想”，我们就以后文为例来对其“文学是人学”的思想进行简要分析。在《批判提纲》中作者重申了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所谈的五个主要问题。（1）文学的任务，“主要应该是影响人，教育人。应该是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在于反映现实”。作者对“现实”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在文艺中，所谓现实就应该是指人的个性（人的思想和行动，理想和愿望）”。（2）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二者“应该是一致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世界观是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的”。但作者认为社会政治观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他“所重视的只是包括在 worldview 中的某些观点的作用，而不是整个 worldview 的作用。具体说来，我所重视的，只是其中的道德观点和美学观点”。而“不必要求作家一定要有最先进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既然一切都决定于作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是在其 worldview 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据此，作者把“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的胜利，说

① 完稿于1957年初，发表于《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② 发表于《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时，作者仅删去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原文要点”和“今天的认识”两部分，“此外基本上没有作什么改动”，原因是：“这不但是为了保存当时的真实思想，也因为今天我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本文所引皆出自此文。